

# 香港文学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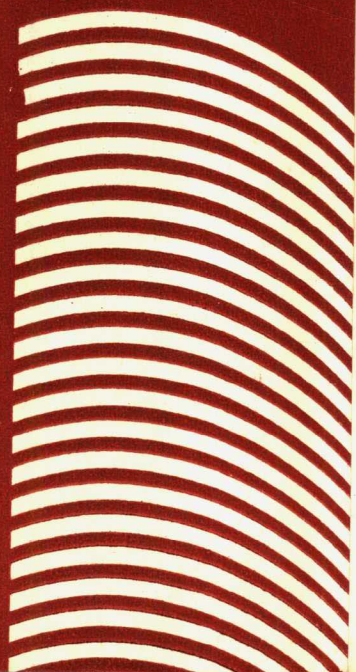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王剑丛 著



# 香港文学史

○ 王剑丛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香港文学史

作 者: 王剑丛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责 任: 宗勇

校 对: 肖飒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吉安地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1万

版 次: 199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6.50元

ISBN7—80579—585—1/I·477

---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国家中华基金资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 序

## 宏伟工程必受重视

刘以鬯

常常听到爱挑剔的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也常常听到爱非议的人说“香港没有文学”。很久以来，这种基于无知作出的粗暴批评，一直在流传，应止不止。

因此，真正关注香港文学的人都在希望学者能够认真地、正确地写一部《香港文学史》，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探讨香港文学的发展与实质。卢玮銮在《漫漫长路上求索者的报告》一文的结尾，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有心有力的人很多，在此默祝《香港文学史》不久就可面世。”

卢玮銮这篇文章是在1984年写的，到了1990年，我们终于看到了谢常青著的《香港新文学简史》。这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自有其重要性。美中不足的是《简史》只写1949年以前30年的香港新文学，读者不能从这本书中看到香港文学的全貌。

接近通史的专著，是《香港文学概观》。这部著作，由潘亚瞰、汪义生合写，出版于1993年，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概略的探究研讨，重在评述，“史”的成分较弱，连潘亚

嗽自己也承认“并非文学史”。唯其如此，即使《概观》填补了一部分空白，我们仍在期望《香港文学史》的出现。

前几天，广州中山大学王剑丛来信，说他“已完成一部《香港文学史》，长四十万字，江西一出版社已同意出版……”，要我写一篇序。王教授没有将书稿寄给我，只寄该书的目录。单看目录，当然无法断定编者是否已正确地审视香港文学的真面目；不过，我觉得这本书蕴藏的积极意义是应该强调的。事实上，我与卢玮銓一样，也在希望有心有力的人写一部《香港文学史》。读了这封信，很高兴，也很兴奋，随即提笔写了几句，不能说是序，只想告诉大家：《香港文学史》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所具的开创性，必须受到重视。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

# 绪言

## 一、香港文学的内涵与分期

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的确，她犹如一颗晶莹闪光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南疆。那儿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市面街道，繁荣堂皇；车辆行人，如流如潮。它是当今世界十大商埠之一，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货柜码头，又与伦敦、苏黎世并列为世界三大黄金贸易中心。同时，在轻工业、旅游业、航运业等方面也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的商业大都会。

香港位于珠江口外侧，与广州相距一百三十公里。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是中国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中国人到过香港并进行开发的史实。从已经发现的古物的体制看，已可以了解到香港一带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赵宋时代，有僧人“杯渡禅师”居住在香港附近的青山，宋室南渡后，宋朝的皇帝也曾避元兵于九龙。康熙年间，清朝政府曾派兵驻守香港，准许内地人民迁

到岛上居住谋生，并准缴纳地税，领地耕种<sup>①</sup>。到了近代，她的历史出现了一段曲折，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屈膝求和的《南京条约》，香港岛从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89年英国又以“保卫地方及防护疆土”和“拓展香港疆界”为由，强迫租借九龙及新界地区，租期为99年，至1997年为止。

### 香港文学的内涵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统治者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又按照英国的模式，发展资本主义。现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等方面，与中国大陆有质的区别，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从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文学，必然与中国大陆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独特性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因而“香港文学”这一概念不仅已被世人承认，而且香港文学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就如台湾文学、澳门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一样。

那么，什么是香港文学？它的内涵怎样，应作何界定，国内外学术界仍有很大分歧。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从狭义看，认为由香港作家所写，反映香港的社会生活和市民心态，而又在香港出版或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的文学作品，是香港文学；另一种从广义看，认为只要由香港作家所写具有香港特色，不管取材于香港或取材于异域或取材于中国大陆，也不管是发表在香港或发表在香港以外的地区的文学作品都应

---

<sup>①</sup> 参阅丁又《香港初期史话》。

该算是香港文学。笔者以为对香港文学应从广义进行界定更为妥当。如果从狭义界定，那么，由香港作家所写的，取材于中国大陆或异域的作品，发表在香港以外地区的作品便无所归属，这样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劳动是不公平的，对于香港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但不管是广义与狭义，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由香港作家所创作。只要由香港作家用华文进行创作，其作品就是香港文学作品。

何时有香港文学？184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香港只不过是一个封建落后的小渔村<sup>①</sup>。这时“香港文学”这一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1842年以后，虽然政治体制已经改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其文化心态和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时期所出现的文学，同样不宜称为香港文学。因它并不具备香港文学的特点。这时期的文学，从性质来看，是属于封建的旧文学，它的形式是文言文，内容大多是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文坛基本上是鸳鸯蝴蝶派的市场。香港作为一个地区，其历史是很长的；香港自有自己的文学，即“香港文学”，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种种原因，其历史则不长。

大约在本世纪的20年代中，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10年，以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伴侣》杂志创刊为标志，它开始有新文学，也就在这个时候，香港文学在新文学的基础上，悄悄地萌芽生长起来。在吕伦、刘火子、谢晨光等新文学作家的努力下，至40年代末发展成型，成为名符其实的香港文学。这可以吕伦的《穷巷》、《黑丽拉》、

---

① 杨奇主编《香港概论》9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无尽的爱》和黄谷柳的《虾球传》等作品得到证明。

## 香港文学的分期

对某一种文学进程进行分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从而把握它的整体面貌。一般文学史的习惯分法,是以该时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作为划分的依据。因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影响。但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其的确是否如此。最好以它的自然发展年轮为依据。香港除1941年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以外,并没有重大的足以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历史事件。根据它的自然发展年轮,香港文学以1949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香港文学前30年和香港文学后40年

五个时期:

拓荒期(20年代中期—1949年)

自立期(50年代)

现代主义传播期(60年代)

通俗文学繁荣期(70年代)

多元化文学时期(80年代)

## 二、香港作家的构成与流变

香港是蕞尔小岛。作家地位不高,但作家的人数却不少,预计有三四百位,知名度较高的大约有八九十位。

由于香港的地位特殊,作家的流动性大,其构成状况与

大陆极不一样。若对这三四百名作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多元构成的组合体。有本土作家，有从海峡两岸去的南迁作家，有从东南亚及欧美等地迁入的作家。主要是前两部分。在香港出生、长大或在外地出生，在香港长大写作成名的，这是本土作家。这一层次的作家，至今已历两代。第一代主要是在香港文学拓荒期出现的。有吕伦、谢晨光、刘火子、张吻冰、黄天石、黄谷柳等。舒巷城和夏易，是在40年代末涉足文坛的。这里也列为第一代本土作家。

在1950年以后开始创作的作家，称为第二代本土作家。这部分作家的人数较多，约占全香港作家总数的三分之一，较有影响的有梁锡华、也斯、西西、张君默、小思、黄国彬、钟晓阳、吴煦斌、何紫、李援华、黄傲云、温健骝、叶妮娜、沈西城、羁魂、胡燕青、黄维梁、陈德锦、古苍梧、亦舒等。他们的创作历史都不长，大多在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搦管。但与第一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文化素质普遍都高，有部分曾留学欧美，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是学院派作家。他们文思敏捷，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学识渊博。有部分追求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多变，形式多样，往往给人一种新鲜感。作品的审美外观与传统艺术有很大的区别。与南迁作家相比也有不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香港的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对香港有深厚的感情。香港自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迅速，成就值得自豪，这种历史的自豪感常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流露了出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较鲜明的香港意识和香港特色。

由海峡两岸移居香港的作家，称为南迁作家。南迁作家至今也有两代：50年代前后去香港的作家称为老一代南迁作

家。他们有刘以鬯、徐许、李辉英、唐人、徐速、高旅、司马长风等。这部分作家大多在大陆已经成名。到香港后一直是香港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创作、编刊物，扶掖新秀，对香港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70年代前后，海峡两岸又有一批作家移居香港，可称为新一代南迁作家。较有代表性的有东瑞、陶然、白洛、陈浩泉、曾敏之、陈娟、张诗剑、傅天虹、王一桃、杨明显、黄河浪、春华、巴桐、古剑、华莎、夏婕、以及余光中、施叔青、严沁等。由大陆移居香港的作家群体，有许多共同性。

首先，他们大多是华侨子弟，曾在蕉风椰雨中的东南亚各国度过青少年时期，50—60年代回国念书，后被分配在基层工作。在此期间，他们（包括非华侨子弟）几乎都过着清贫的生活，经历过一个接一个的诸如反右斗争、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等等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从事着艰辛劳动的同时还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这些政治风浪及所谓“锻炼”，毫无疑问，他们会有复杂而深刻的感受，留下的记忆是难忘的。进入70年代，他们先后移居香港，初到“贵境”时的一段日子相当难过。侥幸的做些文字工作，大多则需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这段不寻常的经历，虽然身心交瘁，彷徨困窘，却让他们经受了人生的磨炼，感受了生活的脉动，有机会体验、观察社会，阅读人生，积累创作素材。到香港后几种不同社会形态（包括南洋各国的生活）的对比，使他们对现实社会、人生看得更清楚，思想变得更成熟，这体现在作品中，显得生活扎实，内涵丰厚。

其次，他们有大体相同的文化教养。他们大多是大学文

科毕业生。不仅受到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们还受到过去60—70年代我国普遍通行的文艺理论思想的熏陶，诸如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源泉论”、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反映论”，写重大题材论，为工农兵服务论等。对这些文艺理论，虽各人所接受的程度不一样，但大都受其影响。这在他们居港之初的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再次，他们的创作历史也大体相同。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先后大学毕业，其时少数人开始发表作品，但并不出名。他们是70年代到香港后才真正走上文学道路的。开始几年属于试笔阶段。他们的成就要到80年代后才显露出来。

新一代南迁作家来港之初，就个人素质说，基本上与大陆作家无异，就文艺思想、文艺观念、审美意识、创作态度而言，他们其实就是大陆作家。他们早期的作品，除题材不同外，整个创作无论是审美外观与审美内核，都与大陆的作品无多大区别，而与香港本土作家却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较注意选取社会的重大题材，主题思想鲜明，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们的作品极少出现主题的晦涩模糊和不可捉摸性。歌颂暴露，爱憎分明，陈残云评价白洛的作品时说：“白洛的每一篇作品的主旨都很明朗，在常见的生活中挖掘鲜活的素材，画龙点睛似的点出了它的社会意义”<sup>①</sup>。他们不作抽象的关于政治、历史、文化的反思，也不作超现实的幻想或“灵”的探索，他们直接从生活撷取素材，以鲜明的立场，表达对现实的理解与看法。

---

① 《香港一条街·序》花城出版社，1984年。

他们较注重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种种丑恶现象，黑魁作恶、少女堕落、商场险诈、家庭纠葛、老少婚姻、爱情陷阱、赌狗赌马、选美丑闻等等都在他们鞭挞和批判之列。在这么广泛的社会批判中，有两个主题常被反复表现与描绘：一是金钱对伦理道德的伤害，一是畸形社会中的畸形人物。这两个主题在香港具有普遍性，也较能揭示香港社会的本质意蕴，所以成为新一代南迁作家早期创作的聚焦点，这是事出有因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他们在内地所受的教育有关。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原有观念与大陆人初来乍到的新鲜感相结合，于是便首先把最易捕捉到的社会生活现象纳入自己的描写范围。新一代南迁作家随着居港岁月的增长，已发生变化。他们“大陆客”的气味逐渐消失，“大陆意识”逐渐淡忘；“香港意识”日渐显现，香港色彩日渐加浓。这使他们与第二代本土作家接近起来。但在整体上，尤其是创作主旨上，审美趣味上仍有距离。他们既相通，又有别，预计很难合流，这是由于两者的经历、原先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文学教养不同所决定的。

香港作家大多是业余的。因稿酬低，专靠写稿难以为生，必须有一项固定的工作以保障生活。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大多是缪斯的忠实信徒，热爱艺术，有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在“打工”之余进行创作的。正是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才使香港文学出现一片绿洲。

职业作家为数极少，专靠卖文为生，为此，他们的写作速度往往极快。有部分作家常常一天内要同时为几个专栏写文章或为几家报纸的副刊写连载小说。这就给部分作品带来艺术性差、思想深度不足的缺陷。不过，多数作家的创作态

度是严肃的，既求快也求好。

香港虽有几百位作家，可向来处于无组织状态。没有像大陆一样有作协、文联之类的组织，也没有上级主管部门，各自为战，处于无组织状态，自生自灭。这极不利于香港文学的发展。不同派系的作家极少坐在一起交流信息，切磋艺术，总结经验，瞻仰未来，这与现代都市的文化要求极不相称。大陆开放改革以来，随着香港文学的受重视，香港作家们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谋求团结，谋求交流提高，促进香港文学的发展已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于是 80 年代以来，全港性的作家组织相继成立。1982 年，由青年作家陈德锦、陈昌锦等发起率先成立香港青年作者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1987 年 11 月 10 日，以倪匡为会长，以石人、胡菊人、黄维梁为主席的香港作家协会也宣告成立，1988 年 1 月，由曾敏之、刘以鬯、何紫、梅子等三十一位作家为发起人，又组成了香港作家联会，出版《香港作家》，会员已有一百余人，还有以戴天为会长，文楼为副会长的香港文学艺术协会，出版《八方》文艺丛刊，其作用也引人瞩目。这些作家艺术家组织的成立，大大改变了作家无组织状态，它不仅对于消除小圈子，增进作家的团结和学术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促进海峡两岸，促进以香港为桥梁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也将做出有益的贡献。

### 三、香港文学的基本特点

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香港文学也是中

国整体文学的一部分。香港文学与台湾文学、澳门文学一样，与祖国大陆文学既有承传关系，又有区别。所谓“区别”，是因香港沦为殖民地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的。香港沦为殖民地后的最初一段时期，虽然有部分作家，创作了与香港社会生活有关的作品，但其内容与形式，跟大陆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谈不上什么特点。本世纪 20 年代末以后经过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努力，香港文学才萌芽、成长起来，并初具香港文学特点。但战时战后两次内地作家涌入香港，使本土作家的创作及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本土性相应冲淡。1949 年，新中国对香港实行新的门户政策。香港与祖国大陆暂时处于隔离状态，它走上了相对发展的道路，这时香港文学的特点才充分显示出来，且越来越鲜明。如果我们把香港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以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参照系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出它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其一，思想主题的开放性。

作家创作一部（篇）作品，都会有某些东西要表达，如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体验、对理想的追求、对事物的爱憎等等，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思想。一般说来，是常见性的，比如弘扬爱国主义、民族感情、美好的伦理道德；追求光明，揭露黑暗，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等。香港的当代文学作品，如果与大陆比较，其主题思想，除常见性外，还表现出一种开放性。即在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爱情观等方面都超越传统观念。如人们对待恋爱，不再看成是丑于见人的事，男女双方恋爱时羞羞答答的已不多见，大多显得大胆而洒脱。对同性恋，也不觉得匪夷所思而大惊小怪。

人们对“性”表现得更坦然，极少有谈“性”色变的情况发生。一个刚十二岁的少女就追求自己将来要有“三十八寸的胸”，与母亲谈及此事不仅毫不羞涩，还要比母亲“青出于蓝”呢。<sup>①</sup>

对于少女的贞节，过去是看得很重的，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少女们若失去贞操，将受到社会的鄙弃，身价一落千丈。她们把保护贞操视为一种美德，为失贞操而轻生者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然而在香港作家笔下，她们并不在乎，少女们没有为失贞操而苦恼，或因此而殉情；男人们似乎也不当一回事，只要符合某些条件，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照样可以结合。有的少女甚至以奉献贞操作为一种补偿，然后彼此一笔勾销，各走各的路。

在描写已为人妻的妇女的作品中，读者已很少看到温顺、柔弱、专事在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她们大多被女强人所代替。这些女强人都有自尊、自强、自立的意识，都希望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她们也与男人一样，有手腕，有魄力，有才干；大胆、豪放。在事业上，在写字楼里敢与男人争高低，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那种依附男人，像一条藤依附一棵大树一样，没有理想追求，虚掷时光的妇女，在这里是受到冷遇受到嘲讽的。女强人的形象，在目前大陆的文学作品中仍不多见。在香港的当代小说中却比比皆是。作者对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她们的聪明才智，干一番事业的雄图抱负无不发出由衷的赞赏。女人与男人一样，同是“人”，同样具有能力才干。在香港，虽然在恋爱婚姻上，男

---

① 亦舒：《我的前半生》中子君与安儿的谈话，花城出版社1987。